

# 毛泽东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动因分析

白立娟<sup>1 2</sup>

(1. 广东工业大学 政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动因,与其社会主义观有关,他认为开展互助合作是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化、提高农村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也是防止农村出现两极分化以及发展工业的需要。当然也因为毛泽东看到土改后的农民不但有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且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搞互助合作是符合农民主观愿望的。我们要防止两种倾向,即认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主观任意的产物,认为毛泽东的主观动因是产生这一政策的唯一原因。

**关键词:**毛泽东; 农民; 互助合作道路; 动因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6917(2013)02 - 0094 - 04

1953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应该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出台具有深刻的主客观原因,毛泽东作为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其主观动因构成了这一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

## 一、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有关

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影响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毛泽东讲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sup>[1]</sup>。所以,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使公有制成为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开展互助合作是实现农业公有制的重要途径。早在 1943 年毛泽东就提出要让农民合作起来的思想。他认为,在中国的农村中,“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

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sup>[2]</sup>。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明确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sup>[3]</sup>。

另外,在一些内外因素的促动下,毛泽东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蓝图在实践中尽快实现。内部因素主要是 3 年恢复国民经济的成就显著,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很高,经过 3 年多的建设,社会主义因素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比重逐步增加,比如到 1952 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增加到 56%。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后到 1953 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日益发展强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已处于领导地位。这使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从人民群众头 3 年生产建设的积极性来看,农业合作化应该也可以实施。从国外来说,来自苏联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压力也是毛泽东

收稿日期:2012 - 11 - 01

基金项目:广东工业大学校级科研补助项目(405095166)

作者简介:白立娟(1979 -),女,广东广州人,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提出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原因。斯大林、联共中央本来就不承认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在斯大林看来,毛泽东这些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用斯大林的话说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红皮白心”的萝卜<sup>[4]</sup>。这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共执政之后不久就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农业也走类似苏联集体农庄式的合作化道路。

## 二、毛泽东认为开展互助合作是提高农村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1953年下半年,我国粮食问题日益突出,开始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毛泽东认为,粮食问题、农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的一大障碍,而消除这一障碍的办法,只靠统购统销政策不够,还要有更加宏观和根本的所有制方面的改变,那就是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1953年10月15日和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在10月15日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sup>[5]</sup>。这说明毛泽东认为合作化是增加农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1950年,刘少奇对东北局有个批评。东北局要把老区的互助组提高一步,要削弱、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刘少奇认为高岗他们违反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说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走集体化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据薄一波的回忆,高岗说刘少奇把这个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就批给了陈伯达,当时毛泽东的表情是面露愠色,但是没有说话<sup>[6]</sup>。1951年,山西省委有一个跟东北局一样的报告。刘少奇还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东西,说它违背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这回,毛泽东没有沉默,批评了刘少奇。他找了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说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早期也有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通过简单的协作分工,也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sup>[7]</sup>。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和意见。

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

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sup>[8]</sup>

1956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编纂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入了报道“王国藩合作社”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和《勤俭办社》这两篇文章。其中《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作为首篇收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了多处文字修改,并写了编者按。按语指出“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sup>[9]</sup>

从毛泽东的以上言语中可知,毛泽东认为靠着农民的互助合作所产生的团结合作的精神和冲天的干劲是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村的生产力的。

## 三、毛泽东认为开展互助合作是防止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获得土地所有权就意味着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可以进行买卖。在当时农民普遍贫困的情况下,有些家庭遇见天灾人祸急需用钱时,就可能卖掉土地,有些条件好一些的农民持续买进土地,于是产生新的贫富差距问题,长此以往,新的地主和雇农又会产生,工农联盟就会遭到破坏。毛泽东对此深表忧虑。他说“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成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在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

题,只有新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sup>[10]</sup>

1953年10月15日,毛泽东说“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sup>[11]</sup>毛泽东认为通过合作社,农民组成一个个大的经济组织,这样在一个大的合作社内,很多人帮助个别的困难群众压力比较小,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这样就可以防止农村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四、毛泽东看到土改后的农民不但有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且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土改后的农村经济特别细小,分散。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大约三户两头牲畜,两户一部犁,十户才有一部水车,占全部农户90%以上的贫农和中农单独生产都有困难,贫农困难尤其多。因此,很多地区的农民自发地组织了互助组。1951年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都兴起农村互助合作运动。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农村中40%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已经成立了3600多个初级社<sup>[12]</sup>。

在农业合作社最初试办时,多数下中农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长沙县草塘乡原下中农李运寅说自己“一无耕牛,二少农具,是个下中农,入社对我只有好处”<sup>[13]</sup>。因为入社对自己有“好处”,所以下中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激情一直到合作化后很长时间仍然维持着。在安徽,凤阳县下中农说“过去种田无牛空起早。人家割稻我栽秧,薄地倒有六、七亩,年年讨饭度时光;入了大社啥不愁,又分钱来又分粮,还农贷、做棉衣,周身上下新到底”,“豆米稀饭扑鼻香,吃在嘴里滋味长,生活改善多亏合作化,衣食保暖难忘共产党”,“农业社是吃奶孩子的妈,散社就等于散了家”<sup>[14]</sup>等等。对于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他们认为情有可原,说“起步难,总归有些弯弯曲曲”,“今

年没有搞好,有了经验明年再重来”。就算是减少收入的人也认为“今年减产是因为受了灾,并不是合作社不好,如果我们不入社,更加要减产”<sup>[15]</sup>。

毛泽东根据掌握的事实材料,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走集体化道路的要求和愿望。他说“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式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是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的积极性。”<sup>[16]</sup>

#### 五、毛泽东认为开展互助合作是发展工业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放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战略,效仿了苏联斯大林模式,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挤压农业、轻工业的方针,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模式,它要求政府集中和控制各种资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各种所有制经济统统纳入计划的轨道,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改造。从毛泽东的相关表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对于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首先,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实现,有利于增强农民购买力,发展轻工业。毛泽东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sup>[17]</sup>

其次,毛泽东认为农业的合作化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原料。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不

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sup>[18]</sup>

最后,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模式可以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市场。毛泽东曾说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sup>[19]</sup>。

综上所述,从对于毛泽东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动因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特定的主观动因对于决策的形成和执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即这一政策是毛泽东主观任意的产物,或者毛泽东的主观动因是产生这一政策的唯一原因。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改造中农业合作化的实现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历史结果,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不是哪一个人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社会主义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所以,我们要充分看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另外,因为毛泽东的主观动因的产生也主要来源于客观,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产生就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而产生的,还有毛泽东也是从当时的农村生产力现状、阶级现状和工业发展现状的角度作出了要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判断,这样的基于事实的判断,毛泽东认为是合理的。当然,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主观因素限制,所以,对于有些事实的掌握不一定全面和翔实,有些判断不一定准确,这就

会影响到农业合作化这一政策的科学性的实现。比如对于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积极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是对于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的判断不够充分和重视,所以,在合作化的后期存在改造过急、工作过粗的问题。但即使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实践探索对于改革开放后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政策的实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总体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上,有两个事实是世界历史上各种革命大变动中罕见的:一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这样的变革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地加强了人民的团结,并且是在人民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

#### 参考文献:

-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702.
-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1.
-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2.
- [4]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8-245.
- [5] [10] [16]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9;437;429.
- [6]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98;191.
- [8] [9] [11] [17] [18] [1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81;227;117;181-182;181-182;182.
- [12] 燕凌.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实现[J].中国社会科学,1981,(6):22-41.
- [13]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21-8-2,1958:147.
- [14] [15]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21-8-1-3,1958:179;179.

责任编辑:黎伟盛